

唐才常和自立军

皮明麻

湖南人民出版社

3

唐才常和自立军

皮明麻

上海人民出版社

146

唐才常和自立军

皮明庥

责任编辑：李沛诚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7,000 印张：4.75 印数：1——5,600

统一书号：11109·226 定价：0.60元



唐才常

1867—1900



从左至右：光 列、唐才质
孙中山、秦力山
沈翔云



林 圭 (1875—1900)



沈 蓀 (1872—1903)



武昌小洪山庚子烈士墓纪念亭。

目 录

第一章 戊戌喋血后的唐才常.....	(1)
汉口闻变.....	(1)
东渡日本.....	(9)
红叶馆饯别归国.....	(15)
第二章 从正气会到自立军.....	(18)
正气会.....	(19)
自立会.....	(28)
张园国会.....	(35)
自立军.....	(41)
第三章 自立军起事的经过.....	(49)
大通之役.....	(50)
汉口起事.....	(56)
张之洞的静观与反脸.....	(61)
唐才常之死.....	(67)
新堤起事和两湖余波.....	(82)
各地党狱.....	(88)

第四章	自立军起事的纲领和性质.....	(93)
	自立军的政治成份.....	(93)
	自立军的纲领.....	(103)
	自立军起事的性质.....	(109)
第五章	自立军起事的意义.....	(115)
第六章	唐才常的变法思想及哲学思想.....	(129)
	布满矛盾的变法思想.....	(129)
	倾向唯物论的二元哲学.....	(136)
	导源于时代和阶级的特点.....	(141)
后 记		(147)

第一章 戊戌喋血后的唐才常

汉口闻变

一九〇〇年的自立军运动，是唐才常实际领导的。唐才常在此之前为清末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与谭嗣同齐名。“两人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浏阳双杰之称。”^①他之步上自立军起事的武装斗争道路，基于其维新救亡思想向革命方向的发展，并直接种因于戊戌喋血，特别是谭嗣同的临刑受戮的刺激。

以“公车上书”为讯号而在一八九八年所发生的戊戌变法，是在甲午战争中国遭到惨败后，瓜分豆剖之祸迫于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局势中，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和爱国运动。代表着这次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目睹时艰，极思拯救国家的危亡，冀图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拥戴光绪皇帝进行君主立宪，实行温和的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当时一部分具有爱国心、民族感，又敏于时政的士大夫，响应于长城内外，大河南北，使维新思潮风靡一时。不过，卷进维新浪潮中的毕竟是整个社会中“薄薄的一层”，而且都是些手无寸铁的文人学士。他们善良而又温和的变法主张，并不见容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尽管他们辛辛苦苦地忙碌了几个月，但老于权谋的慈禧和荣禄、

^① 胡石庵：《烈士唐才常事略》，载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九四六年版。

袁世凯在密室中一策划，便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发动一场政变，快刀斩乱麻似的杀了“六君子”，囚了光绪帝，宣告了“百日维新”的天亡。幸免于难的康有为远遁香港，梁启超也在日本友人的护送下，坐上日本军舰逃往日本。

“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康、梁之肱股，维新派中的左翼分子。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绪帝下诏变法，谭嗣同被召参与实施新政，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在慈禧杀机毕露、北京城中风雨如磐之际，谭嗣同本可远遁，免罹杀身之祸。可是这位爱国志士、热血男儿，抱定殉难之决心，慨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

当戊戌变法方兴未艾之时，谭嗣同在北京曾致电留长沙的至友唐才常，约其赴京共襄政务。唐才常抱着巨大的希望，欣然应邀赴京。可是，他刚刚到达汉口，北京已发生政变。这犹如晴天霹靂，给他的打击是惨重的。然而，这种打击并没有使他颓唐、沮丧和倒退，而是从相反的方向给了他一种继续前进的推动力。他就是在谭嗣同戊戌喋血后所积蓄的愤懑中，开始谋求新的进击，而拟定雄心勃勃的自立军起事的大计划的。康有为说：“嗣同蒙难，才常愤痛，日思复仇，以救圣主，拯中国。”^② 这种说法，大体上是符合唐才常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唐才常，字绂丞，后改佛尘，又自署泚澣子，湖南浏阳人。一八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同治六年四月初九日）出生于浏阳县城孝义里的一个不富裕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祖父雁峰潜心典籍，

① 梁启超：《谭嗣同传》，见《戊戌变法》（四），第53页。

② 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见《唐才常集》附录，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第266页。

不求仕进。父寿田教授乡里，亦不尚八股试帖，常聚生徒讲习经籍微言大义，广植桃李。唐才常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自幼家学相承，形成了田实的国学根底，也深受先辈夷夏大防一类传统民族思想的濡染。一八八六年，唐才常二十岁时，应童子试，以“小三元”及第（县、府、道三试冠军）成秀才。二十岁以前的唐才常，据其自叙，“忆吾未冠以前，低首摧眉，钻研故纸，瞑目枯索，抗为孤诣秘理，沾沾自足，绝不知人世间复有天日，复有诟耻之事。”^①

但困绌的家境和不乐仕进的家教，使唐才常并未全力去夺取科举场中的功名。为了济家和事亲，唐才常应聘就本乡刘春台家教席。不久，便入长沙岳麓书院攻读，兼在校经书院附课。从浏阳到长沙，使唐才常视野有所拓展。他鄙弃八股辞章的腐败谄陋，与同窗好友共攻经史，切磋经世致用之学。一八九一年，他应四川学使瞿鸿禨之聘，任学署阅卷及校读。第二年五月东归浏阳，在同邑学者欧阳中鹄家塾教书。这时尽管唐才常已开始有了“经世致用”之念，但经什么世，致什么用，心中是朦胧而不具体的。当时的唐才常基本上还是闭门读书，“课读之暇，看书静坐而已。”对现实的态度仍然是冷漠的。

不过这种寂寞得如一潭死水的书斋生活，终于被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所打破。以此为转机，唐才常结束了他封建士子的前期生活，开始了维新图变的新历程。经过这次突变，他真的是前后判若两人。

一八九四年，唐才常考入武昌两湖书院。此时海禁大开，西学东渐，新思潮、新学问的浪潮冲击着江汉大地。武汉作为两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一八六一年开埠以来，帝国主

^① 《唐才常集》，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第161页。

义势力加紧渗透，不久后，张之洞又在这里建厂矿、兴学堂、练新军，大力开展洋务运动，因而风气渐开。唐才常就读的两湖书院是张之洞所一手创办和经营的重点学堂，其办学的根本目的，是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然而西学的引进，就不能不使学生多少接触外国资本主义的文明。唐才常正是有了这种机缘，采撷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新知。在这时，旧权威凌替，人们思想渐渐解放。也就在这时，甲午之战和与之俱来的“马关条约”，象警钟般震撼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它唤醒了谭嗣同，唤醒了唐才常，唤醒了一群人。当时的两湖书院情绪尤为愤激。因为张之洞和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素为政敌，张力主毁约再战，攻击李鸿章割地求和，请求杀李以谢天下。唐才常对张的政治作态颇为钦佩，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张之洞这个老师可敬的形象，因而盛赞张之洞直言敢谏，一时无双。实际上张之洞的反对李鸿章，包含着复杂的积怨在其中，与完全出自爱国热情有所不同。

在甲午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之前，唐才常的心情是十分不平静的。他说：“会东事起，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警报日夕数至。朝野上下，震悼失图。于是乡曲之儒，谈虎色变，亦稍稍生热力，萌动机矣。”^①他给次弟才中的信，愤激之情跃然纸上：“和议一事，太觉不堪，大约十款，以割台湾、赔二万万两、管东南机器局、内地屯兵数者为最恶。”“中倭和议已成，可耻万分。”^②

在书院同窗中，唐才常与同邑谭嗣同、刘善涵志同道合，一起经历了甲午战败后的思想遽变。谭嗣同之父谭继洵时为湖北巡

①② 《唐才常集》第158页、第269页。

抚，嗣同居抚署，与唐才过从甚密。他们研习学问，议论时政，爱国热忱和维新图变思想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就个人气质而言，唐才常是稳健而长于深思的，具有经过苦心探索而确立自己意志的内秀。他从长期书斋生活中终于有了新思想的萌发，是来之不易的，但一当冲破了旧的思想牢笼，他再也不会回到老路上去。

一八九六年，唐才常返回长沙。此时，由甲午战败后所酿成的维新变法运动正方兴未艾，康有为、梁启超对维新变法鼓荡尤力。唐才常对这一运动充满希望，对康有为以“当代一人”推之。康、梁把改革教育视为要图，唐才常亦开始注重教育之改革，曾说：“他无进境，惟时局之变及学校人才之必当改弦更辙，可见一斑。”^①而当时湖南又是全国维新运动活跃的重要地区，对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来说，这正是大显身手的场所。

此时，陈宝箴抚湘，规划新政，提倡洋务，倾向维新。维新派人物黄遵宪任湖南按察使，江标、徐仁铸先后任学政。他们共襄新政，一时间开学堂，设学会，立报馆，办警察，种种新政次第而兴。这一班同道，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陈宝箴曾对唐才常说：“今日之师生循故事也，若以学问经济论，吾当北面事君。”^②陈对唐其见重如此。

一八九七年，唐应拔贡试获售。同年，《湘学新报》创刊于长沙，江标、徐仁铸、黄遵宪任督办，唐才常为总撰述。《湘学新报》报导国内外政闻和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商学、交涉学知识，持论主孔子改制之说，为维新变法张本。该报共出四十五册

① 《唐才常集》第248页。

② 田野橘次：《浏阳唐佛尘传》，载一九一四年北华编辑社《朝野新谈》（丁篇），第20页。

(每月三册),报中文字,许多出自唐才常手笔。他的《外交论》、《公法总论》、《各国政教公理总论》等一系列文章,对资本主义西方诸国的政治、历史、外交、实业进行介绍,企图诱导士大夫抛弃无补时艰的八股旧学,转向经世致用的新学。其政治态度之激进,驾梁启超之上。无怪乎人们说:“甲午后创湘学报,言变法,与梁启超时务报,并风行海内,而持论雄迈尤过之。”^①这份报纸,在长沙就销售一千多份,颇具社会影响。唐才常和谭嗣同还创新政于乡梓,废书院,建浏阳算学馆,积极推动家乡浏阳的教育改革,使同邑青年求实学以济时用。不久,熊希龄佐政湖南,任长沙时务学堂提调,并创办《湘报》,总撰述仍为唐才常。该报发刊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七日,同年十月十五日停刊,前后共出版一百七十七号。由唐才常主编的初期《湘报》,热心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政见和社会学说,在同封建思想作斗争中显示出相当的活力。唐才常本人在《湘报》上发表的文章,已不同于《湘学新报》上一般介绍西学、西政和议论时政、倡言改革的文字。这时他除了尖锐地抨击清朝专制统治外,又更多地侧重于研究实际的社会问题,提出改革的具体主张。如《湖南设保卫局议》、《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等文,都有明显、具体的针对性;同时,在立论变法的姿态上,也较前更为激进,甚至提出皇帝要下罪己诏以收拾人心,要召开国会疏通上下,要改革官制,起用维新人士,将守旧者罢归乡里,要按国际公法修改律例,要废除八股,要联合英、日抵制沙俄等等。因此,招来湖南顽固派的代表人物王先谦、叶德辉对《湘报》百般诬蔑、攻击。洋务派大官僚、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湘报》刊登了易鼎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

^① 尚秉和:《唐才常》,载《戊戌变法》(四)第89页。

两重”，便打电报指示要“谕导阻止，设法更正”。陈宝箴接电后慌了手脚，当即复电表示认错，并说：“以后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①自此之后（《湘报》六十六号），《湘报》上就再也看不见谭嗣同、唐才常的文章了。

一八九八年，长沙还成立了南学会，以孝廉堂为会所，聚官绅数百，由皮锡瑞等人讲述古今学术源流及时务，答问讨论，开风气之先，湖南各地讲学之风亦随之兴起。唐才常与欧阳自耘、黎少谷等人，于这年三月创办群萌学会于浏阳，讲学论政，播发新知，并广置书刊，备邑人阅览。该会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南学会同被解散。

当时湖南最高学府为时务学堂，由熊希龄任总理。谭嗣同、唐才常等均参加学堂工作，议订章程。该堂还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英文总教习。不久梁、李赴沪，便由唐才常、欧榘甲继任。唐才常以王船山、黄黎洲、顾亭林的思想、学说启迪诸生，从《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引申其绪，发挥民族思想，为维新事业播发舆论。当时康有为打着“孔子改制”的旗号，提出变法理论。唐才常在学术思想方面，原来兼重汉学和宋学，甲午战后转向今文经学。在时务学堂时，唐才常就是师承今文经学，以宣传康有为的“素王改制”学说为己任的。他们通过这样迥然不同于旧书院的教学，为维新运动厚植人才，可谓是独步一时的。

一八九八年夏秋，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这时，光绪帝诏定国是，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又一连颁布了保护工商业、修路开矿、奖励科学、整饬财政、裁撤冗员、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兴学堂、办报纸等除旧布新的政令。唐才常颇

^① 《湘报》序（影印本）。

受鼓舞，对维新变法运动充满期望。当他的好友谭嗣同从北京来电促其进京时，他欣然就道，出洞庭湖北上，满以为迎接他的将是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岂料维新派开心奋发之日，却是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嫉恨达于顶点之时。维新派加紧了变法的步伐，顽固派阴谋活动的脚步却迈得更快了。慈禧和荣禄、袁世凯策划于密室，以突然袭击的政变手段在九月二十一日囚禁光绪帝，紧接着逮捕和杀害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康、梁则被迫流亡海外。

这时唐才常已到达汉口。政变的恶耗把他从希望重重的高峰，一下推进了冰窟窿里。他想起挚友谭嗣同的惨死，不禁失声痛哭。他椎心泣血写下的一幅挽联，抒发了内心的极度悲愤：“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①

谭嗣同遇害，唐才常本欲赴北京收葬，后知骸骨已南归，乃折回湖南。谭在狱中时，存“题壁”一首：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诗中的“两昆仑”，很可能一指谭嗣同自己，一指唐才常。因为两人为刎颈交，在此之前谭又曾电约唐才常赴京，谭的绝命

① 《唐才常集》第265页。

诗视才常如昆仑之重，对他寄托着无限的信赖之情。^①唐才常的满腹悲伤和谭嗣同临刑前的期许遥遥相契。他的悲伤转为愤激，愤激形成力量。他思想深深渗入了为死友“两肋插刀”的复仇情绪，对慈禧的祸国残民遽萌反志。此时此刻的唐才常，象加大了油门的发动机一样，腾起了一股更加猛烈的力量，准备新的进击。他到湖南后，料理好家务，就急赴上海，筹划新的行动，正如自立军参加者赵必振所说：“唐才常愤国事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②

东 渡 日 本

在上海经过短暂的磋商后，唐才常转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联络流亡海外志士、侨胞、留学生和外国友人，以图匡救祖国。在日本，他谒晤了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麦孟华、徐勤等康党人物。唐才常并不是康有为的嫡传弟子。他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其宗旨微有不合处，初不敢苟同”，但“因（康有为）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拜服南海五体投地”^③。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掌教鞭，将唐拉入康门，但唐在国内从未见过康有为。“君初不识南海，至是出游日本，始于东京旅邸谒康，自请受业为弟子，康亦以高足弟子视之。”^④此次晤康之

① “肝胆两昆仑”，亦有另三说，如梁启超谓：“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则将“两昆仑”解释为唐才常和王五。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论谭嗣同》中，则解释为“康有为和他（谭嗣同）或去或留各有自己的抱负。”

② 《自立会纪实史料》，载《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一九八三年版第34页。

③ 《唐才常集》第238页。

④ 《义士唐才常传》，《清议报》合编卷十五，第71页。